

如何评价刚刚过去的2020年给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在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2020年都是人类生活和经济、文化的分水岭。接下来的日子里,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概率将大大增加”。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应该如何布局?

对此,陈平原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参照经济领域实行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做法,重构高等教育的内循环与外循环协同发展的格局与机制。

## 中国大学不能“过分自信”

十多年前,陈平原曾在媒体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国人办现代大学是从模仿起步的,从最初模仿日德,到上世纪20年代转而学习美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学苏联,再到上世纪80年代学习美国。“现在谈大学则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用说其他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跟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在文章中,陈平原如此写道。

在他看来,这种趋势可看作国内大学的一种迷失。“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容易固步自封。但反过来,一切惟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这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陈平原表示,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的,我们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以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盲目制定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

“这是我十多年前说的话。当时有感于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主流,以至于出现了若干偏差,因此想强调中国学者和中国学术既需要国际视野,更需要本土情怀。”在近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陈平原说。不过,随着形势的改变,他的担忧正在发生变化。

陈平原表示,不同于此前中国大学的“不自信”,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内大学正在出现一种相反的倾向,即过分自信,自以为可以关起门来称老大。

“经过疫情的考验,我们忽然发现,美国并不像大众想象的那样强大,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也确实正在消失和融化。未来全球格局有可能变得更趋多元,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但请记住,这是个缓慢且漫长的过程。”陈平原说,即便看到这一趋势,但若操之过急,效果也不会好。“落实到教育层面,那就是要承认,直到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高教强国依然有着太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未来,多派、多送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出去仍是我国发展高等教育的题中之义。”

## 从重学校到重专业

受访时,陈平原坦言,自己一方面很担心国内重新回到“闭关”的状态,另一方面,对于目前我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阻碍也颇感无奈。

“这种状态促使我们反省这些年我们走过的路,是否将学习目标太过于集中在美国。因此我才提议,积极开拓高等教育更加开阔的国际交流空间,建立更富活力的外循环机制。”

谈及“外循环”的概念,陈平原解释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接触并且推崇的国外大学其实是五花八门的。“以我熟悉的人文学科为例,我们的主要交流对象就包括了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苏联等一系列国家。”然而,受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大学排名牵引,多年来,我们越来越倾向于美国这一国家,而这是需要改变的。“美国高校确实了不起,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宗旨、路径和认知必须向全世界扩展开去。”

他进一步解释说,公众对于美国高校的推崇,除了其自身的实力强劲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大众对高校实力的认知主要来自各种排行榜。“排行榜是包含办学经费、科研成果、学术环境、人才趋势以及运作策略等各因素的综合考评,好处是一目了然,缺点则是很难体现某一具体专业的实力。这里还不包括评审过程中的人为失误。”

作为教育学者,陈平原曾在很多场合批评过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并认定其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弊大于利。他对《中国科学报》表示,我国高等教育需要重新理解世界大学发展路径及基本格局,摆脱各种大学排行榜的羁绊,不以争取排行榜上的好名次为办学宗旨和目标。

“作为2020年高教界的一个热点事件,曲阜师范大学的数学专业在大学排名中超出了北大、清华,但这不仅没有受到褒奖,反而遭到了国人的普遍嘲笑。事实上,曲阜师范大学的所作所为是符合排行榜规则的,只不过用力过度,出了漏网而已。很多中国大学其实都有这种心态,也都在这么做。”陈平原说,这本身已说明了对大学排行榜“不可迷信”。

不唯排行榜,当我们选择高校时,该以什么作为评判标准呢?

对此,陈平原表示,在对外交流中我们需要做出一些调整,那就是从以高校的整体实力为主要关注点,转向更加关注高校在某一具体学科或专业的表现。

“有志出国留学的学生,尤其是以科学

# 陈平原：高等教育须构建内外双循环格局

■本报记者 陈彬



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的政治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也深刻影响了全球高等教育的格局。对此,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应作出怎样的应对?

在陈平原看来,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即构建高等教育的内外双循环机制——对内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支持,进而保证高等教育内循环的健康稳定;对外则要加强与欧洲等地区的教育和人才交流,构建一个更加均衡、覆盖范围更广的高等教育外循环圈。

研究为最终追求的学生,应该完全有能力分辨哪些高校的专业与自身选择更加匹配。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这些学生将自身的关注点从学校层面转移到专业层面。”陈平原说。此时,学生就会发觉,某些综合实力很强、位于金字塔尖的学校,其具体专业不见得是最好的。反之,某些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在其优势专业领域却往往令人刮目相看。与此相适应,政府相关部门在录用及奖励人才时,也不能再以大学排名前一百作为衡量标准,而应该更看重其所学专业。

这一变化看似微小,但如果放置在高等教育外循环的大背景下,则会产生巨大影响。

## 欧洲大学的“新机会”

陈平原坦言,当下,有关部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有义务和责任提供更为详尽、务实的名单,以指导留学生或访问学者转投综合实力非一流,但单科发展很好的大学。这既是对学生的负责,也有利于国家日后的发展。

“仅以欧洲为例,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在学科或专业领域,就会发现除英国、德国等高等教育大国之外,某些整体高等教育并不发达的国家,其高校的某些专业却表现不俗。”陈平原说。比如在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古老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固然实力雄厚,但诸如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等综合实力相对较弱的高校,同样具有很好的科研与教学实力;而在农业与林业学科,荷兰瓦格宁赫大学的实力甚至要超过很多欧洲顶级大学。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现象,近年来国内高校与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更多偏重于科研领域,在教学领域的交流则相对较少,甚至流于

形式。”陈平原表示,近年不少欧洲国家受经济因素影响,其高等教育发展遇到了困难,这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搭建彼此交流平台的重要时机。

“正如此前所说,我们可以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分流至这些综合实力并非一流,但单科实力较强的大学,同时,对于这些国家的学生,我们同样可以敞开心扉。”陈平原告诉记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曾为东欧国家培养了不少留学生,但此后这些生源逐渐被美国等高校所吸引。“比如,我们正在实施的‘新汉学计划’是否可以更多地关注这些区域?”他说,目前该计划主要针对的是博士生层面,但是否也可以将其资助范围扩大至硕士生乃至于本科生阶段,由此构建一个更加均衡、覆盖范围更广的高等教育外循环圈?

## 教育不能只讲效益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特别是国内顶尖高校,其师资水平、经济收入、科研条件等,已经和国外优秀大学没有太大差别。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硬件建设、经费保证甚至可以和世界一流大学媲美。

然而与此同时,很多地方院校却依然处于经费拮据、办学状态堪忧的状况。虽然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更多政策,试图弥补各高校之间的差距,但收效并不明显。在陈平原看来,这涉及到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循环——内循环的健康与稳定。

此前,陈平原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及,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等高校高歌猛进的同时,必须回过头来考虑那些不在原“985工程”和原“211工程”序列中的大学所面临的艰难。

文章中,陈平原写道,“目前中国教育采取的其实是‘举国办奥运’的思路,换句话说,既然暂时没有办法让全民热爱体育、身体健康,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来加强训练,目标是奥运金牌。但不能忽视的是,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底层的水平上不来,顶端肯定会出问题。没有很好的教育规划,光靠若干所名牌大学,内地的高等教育无力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这段论述曾引发争议。在有些人看来,同样是投钱,应该投在基础好的大学,这样才能实现更高的产出比。如果原有学校水平不够,需要花费资金打地基,这会导致学校发展进度相对缓慢。

对此,陈平原表示,教育学不同于经济学,不能只讲效益。“为什么我们坚持高等教育的相对均衡发展?这并不是主张有钱人家分,而是除了公平原则外,还需要考虑国家发展的战略。”他坦言,中国大学的两极化其实早已存在,“双一流”建设则很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在我看来,如何帮助弱势大学培育、引进、留住人才,这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样,应该成为国家战略。”

他进一步解释道,除非降低标准,否则“双一流”是不可能遍地开花的。这就意味着全国两千多所大学都要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是不现实的。“‘双一流’建设应该只是众多教育制度安排中的一种,我们还有很多评价体系以及拨款机制,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否则,就有可能出现有幸入列的大学‘三千宠爱于一身’;不幸落选的大学‘零落成泥碾作尘’。这显然不是理想状态。”

## 用“地方粮票”留下本土人才

不同地区高校的差异化问题,集中体现在东西部高校之间。而在陈平原看来,制约西部高校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如何解决西部高校人才的在地化问题。

“大学不是研究院,单纯计算科研成果不足以评价其高低、得失和成败。大学出成果,但大学更出人才,而人才是有适应度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尤其如此。”陈平原说,想象全国各行各业都需要某个一流大学或某个一流学科的毕业生,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培养的人才除了要具有国际视野外,更要有本土情怀。

在西部高校进行调研时,陈平原曾听新疆地区教育部门的领导说,多年来,新疆各大学培养的博士有92%留在了本地工作,而北大、清华等名校培养的博士却很少愿意入疆。

“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西部高校人才的在地化对当地教育、科研乃至经济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面对东部高校的高薪挖人,我们又该拿什么来留住这些人才呢?”陈平原说,曾有西部高校的校长向他抱怨,每当某些人才计划的评选结果公布的时候,这些校长的内心都十分纠结,既担心自己的老师评不上,又担心评上——评不上是一种失败,但评上了就可能很快被其他高校挖走。

在他看来,在西部高校经济实力尚无法与东部高校相抗衡的当下,我们需要通过某种“地方粮票”的方式,保证一批人愿意且能够扎根西部。

“我曾不止一次提出建议,为更好地体现高层次人才称号向西部倾斜的政策,应该设立专门针对西部地区的人才计划。”陈平原解释说,为了突出公平性,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关于人才计划的选拔制度,其主要参考标准均为科研成果,只有在终审阶段才将西部因素列为参考要素。由于各地区科研环境以及人才储备悬殊,西部大学若没有名额限定,其实是无法获得保护的。“很多西部地区的人才,事实上还没进入终审环节就已经被淘汰了。”

此前,教育部曾鼓励东部大学教授去西部申请某些人才计划且颁布了一些扶持政策,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申请到西部去的这些教师不见得能全力以赴,即便到任且发挥了很好作用,大多也会在三年内回归,留下了诸多衔接的难题。

“如果能设立专门针对西部高校的人才计划,哪怕降低一些标准,也能起到提振士气、培育人才的作用。”在陈平原的设想中,这种人才计划可以分配到各个省份,并且只针对工作于西部大学的教授,如果该教授离开西部,则相关称号以及福利待遇全部取消。“这种方式就是所谓的‘地方粮票’。”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在提出“五唯”的同时,也鼓励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人才称号入选者与学校签订长期服务合同,为实施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贡献力量。然而在陈平原看来,如果只是“鼓励”或“提倡”,且牵涉这么大的面,落实是有一定难度的。只要去西部走走,不难了解那里的办学情况,以及长期坚守西部的学者们的努力和工作意义。正因为如此,陈平原才一直强调,要给予这些学者一定的荣誉和待遇。“若担心冲击原有的奖励计划,只要国家愿意承认相关头衔,完全可以通过筹集民间资金等方式,解决相关的经费问题。”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依然生机勃勃。若能通过某些政策调整以及区域资源的合理调配,建立并改善高等教育的内外双循环结构,则中国大学当能保持开放、健康、快速的发展势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陈平原说。



就在今年春节前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通知,将我国学科门类从原有的13个增至14个,新增门类为“交叉学科”。自此,交叉学科在我国学科目录中有了明确归属。

而在之前,学科交叉在国内教育科研机构已相继开展。据教育部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6月,完成交叉学科备案的高校共有160所,交叉学科共计549个。然而,伴随着学科交叉的蓬勃兴起,其中以“结果导向”为目标的学科交叉及其产生的一系列效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学科健康发展,这一问题急需引起国家和高校的高度重视。

所谓“结果导向”的学科交叉,泛指学者为了在学术评价中获得更多的优势和利益(即结果)而采取的“为了学科交叉而交叉”的做法。这种做法所追求的仅是形式上而非实质性的成果。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下交叉学科发展走到了重要关头。

“结果导向”的学科交叉不利于学科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冒牌”成果往往更能够获得竞争性教育科研资源,这就导致本应该用于学科内涵建设的大量资源被占据。因为在现行的教育科研评价和管理体系中,论文、课题等依旧是学者个体职业发展和学术机构学科评比、排名的重要指标,客观上交叉学科形式的论文和课题往往更具竞争优势,自然“结果导向”的学科交叉就会吸引各路人马和资源不断加入。

比如,早先“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兴起,很多学术论文是“某论+”;之后又是“互联网+”,现在又时兴“人工智能+”,但其中许多论文并无实质性学科交叉。套上交叉学科的“帽子”,只是为了提高发表论文的“命中率”。现在纳米科学技术也属于热门领域,许多学者便“巧妙”地把论文、申报课题整成“纳米+”,其中有些论文、申报课题并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但却因为有了“纳米”而机会多多。再有,教育学与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最后竟变成了在教育学位论文中加入数理统计、数学模型等固化模式。

还有一点必须提一下,类似体育、艺术类以技能见长的学科,一旦开展学科交叉且以发表论文、申报课题数量为衡量标准,就会出现一线体育、艺术类高水平教师因论文、课题缺乏而发展受阻;相反,其他学科的学者则可以凭着交叉学科的发文优势而资源“通吃”,最终造成体育、艺术类学科得不到良好的发展,同时也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局面。总之,各种“结果导向”的学科交叉影响学科内涵建设的情况并不少见。

要避免出现“结果导向”的学科交叉现象,改革不科学的评价导向是关键。当前,学科交叉中出现的“热门”挤掉“冷门”、“短线”挤掉“长线”、“硬科学”挤掉“软科学”、“定量”挤掉“定性”等情况,本质上都是“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

是什么造成“结果导向”的学科交叉大有市场?是什么让那些包装出来的“绣花枕头”可以更有机会发表论文和获得课题?又是什么让不同种类的交叉学科都要以论文和课题作为统一的评价标准?基层教育科研工作者痛惜这种“结果导向”的学科交叉影响学科内涵发展和人才培养等,其实相关领导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上面就是这么要求的”“规则就是这么定的”是他们的说辞,也是心里话。

的确,交叉学科的快速发展和科学评价、规范管理的节奏是客观现实。好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经在研究制定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的相关办法,进一步明确什么是交叉学科、交叉学科如何建设发展、依托交叉学科如何开展人才培养等基本问题,并在交叉学科设置条件、设置程序、学位授权与授予、质量保证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交叉学科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问题导向”为目标和评价标准。其实,学科本身就是从解决社会需求的各种问题中不断发展和凝练而来的。今天我们称之为交叉学科的学科,很可能在若干年后就会发展成为一门学界公认的学科。因此,解决问题才是学科发展的内在依据和动力,评价交叉学科成果的标准毫无例外也是问题解决的水平 and 实际贡献。

鉴于目前国内交叉学科评价和管理的体制机制还不够成熟和完备,为避免各种钻政策、制度漏洞的投机学科交叉行为破坏良好发展局面,眼下不必急着对交叉学科进行过多的评比,应给予交叉学科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以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交叉学科解决实际问题的实际成果“瓜熟蒂落”并得到实践的检验。同时,也只有以“问题解决”来评价交叉学科成果,才能让那些为了名利而“结果导向”的交叉学科知难而退。

(本文系同济大学“教育科技评估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2120200324)阶段成果)

## 莫让「结果导向」削弱学科交叉内涵发展